



内容提要

本书从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通过空间、历史和权力之间的论争，探究晚清民国时期苏州从一座古都到现代城市的重建过程。苏州一直是中国都市化和经济富足的中心，1895年开放为通商口岸。为了维护政治权力，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对抗日本侵蚀，中国的商人与官员挪用了西式都市规划建设苏州。结果，苏州的城市景观，无论是总体还是个别部分，都呈现出商业化与民族主义的新特征。日本僧人和游客、中国官员、当地百姓等在此纷纷展开角逐，由此上演了一出戏，戏的内容即为苏州现代性的过程。

作者简介

柯必德（Peter J. Carroll），美国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学士，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专攻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史。现为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同时负责亚洲研究项目。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史、中国的现代主义、物质文化、性别史和民族主义。2006年，专著《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美国城市史学会2007年最佳图书奖（非北美类图书）。

译者简介

何方昱，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思想史、教育史及城市人文遗产。专著《“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2008）获第六届上海历史学会奖（2009）。曾翻译出版唐纳德·F·拉赫（Donald F.Lach）：《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二卷第三册《学术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

上架建议：历史

ISBN 978-7-5326-4254-0



9 787532 642540 >

定价：66.00 元

www.cishu.com.cn

易文网：www.ewen.co

天堂与现代性之间 建设苏州(1895—1937)

【美】柯必德著 何方昱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 /
(美) 柯必德著；何方显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12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

书名原文：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
reconstructing Suzhou: 1895—1937
ISBN 978 - 7 - 5326 - 4254 - 0

I . ①天… II . ①柯… ②何… III . ①城市史—苏州
市—1895～1937 IV . ①K295. 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1864 号

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 RECONSTRUCTING SUZHOU, 1895 - 1937
by Peter J. Carroll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2006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本书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人文遗产研究”创新团队项目资助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

(美) 柯必德著，何方显译

责任编辑/竺金琳 特邀编辑/王瑞祥 封面设计/姜明 版式设计/杨钟玮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辞书出版社出版

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cishu.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5.75 字数 300 000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4254 - 0/K · 977
定价：66.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66700301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资助项目

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编纂委员会

主任

熊月之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学强 卢汉超 李培德 何一民 宋钻友

张利民 金大陆 承 载 梁元生 熊月之

黎志刚 戴一峰

谨以本书纪念 Ken Gerber 和 Michael G. Powell, 感谢他们陪伴我探索这些美妙的城市：纽黑文、纽约、费城、中世纪的里昂、晚清民国时期的苏州。

总序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城市的出现均有五千以上的历史,但是,城市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出现,还是近五十多年的事。

近代以前,城市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随着 18 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加快。1800 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3%。1900 年上升为 13.6%。2007 年 5 月 23 日,世界城市化率首次超过 50%,也就是说,世界城市人口从此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在 1949 年的城市化率为 10.6%。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加快。至 2008 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 46%,有 655 座城市,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 122 座,超大城市 39 座,有 6.07 亿城市人口,地级市以上城市的 GDP 已占全国的 62%。

无论在世界,在中国,城市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地位的日益加重,城市史研究突飞猛进。

在西方,城市史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国,城市史

开始受到重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于发达国家二十年，但大体上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提速同步。1986 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史被列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对城市史研究的整体重视。此后，中国城市史研究呈井喷之势，疾速发展，各种城市史论著，包括单体城市研究、城市群研究、不同类型城市比较研究、城市史研究方法研究等，姹紫嫣红，目不暇给。与此相一致，国际学术界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也快速发展，对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成都、杭州、苏州、扬州、自贡等均有专著出版，其中对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研究成果尤为丰富。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已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领域，国内外不同学术背景的机构、学者就城市史研究进行学术交流、合作已是常态。前几年，我们选译过一套《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凡 12 本，颇受学界重视，但也有诸多遗珠之憾。有鉴于此，我们选译了这套《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意在介绍海外学者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就风格而言，这套书是《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的继续，就范围而言，则是《海外上海史研究译丛》的放大。

翻译本是苦活，加上研究单位在成果考核时，多不给译作计分，这样，此项工作的推进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令人欣慰的是，有一批学者乐于此道，志在学术，甘于奉献。我们相信，此项工作对于繁荣中国城市史研究、提升中国城市史研究水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众擎易举。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同行加入进来！

熊月之

2009 年 10 月 28 日

中文版序言

很高兴看到中文版《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设苏州(1895—1937)》一书与中文读者见面。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美国历史学者，我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书，与来自北美洲、南美洲、欧洲、亚洲(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打交道，惠我良多；与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和艺术的同行们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令我收获颇丰。我尤其珍视与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亚洲各地同行们的这种联系。这本书和我的其他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均受益于中文世界的学术成果。我也收到来自苏州、上海、广州、台北、香港等地同行的反馈。很高兴，在我的对话者中，现在可以加上数量庞大的中文读者了。

本书检视苏州都市现代性的第一次重建。1937年(本项研究终结于此)以后，苏州和其他城市仍在继续进行着现代重建。之后的这些转变一直被认为非常重要，以至于本书所讨论的晚清、民国时期的这些努力多被忘记或遗漏，它们被视为局部的或无足轻重的。相信读者诸君能够判断这些评价是否正确合理。我只是想要强调，城市空间与生活方式的重建，以及苏州最初现代化的觉醒，

对于设计者而言，既受到之前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的影响，又亲历着这些变化。而且，城市的变化带来了破坏，由此引发的冲突有增无减。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城市化的追求以及全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都令许多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事件在苏州及其他城市继续上演。我希望苏州及中国其他地方的读者能够发现晚清民国时期，对于国家权力、公共意识、资本及社会环境的再造，有助于评估它们与不断变化的都市空间之间达成的契约。

我要特别感谢熊月之教授，他慷慨地提供了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机会。我非常感激他对于本书的兴趣及支持，对于本书中文版被纳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颇具声望的《海外中国城市史研究译丛》亦深感荣幸。对于本书译者何方昱副研究员，我也深表谢意。衷心感谢她为这个项目付出的细致努力与不懈热情。同时我也感谢陈豪博士，他运用自己深受经典影响的对于现代中文的感受力，仔细校阅了译稿。本书有几处地方反映了我的后续研究，但中文版仍与英文版保持一致。本书的任何疏漏与错误均由我承担。

2013年7月5日

致 谢

既然本书源自我的博士论文,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教授。没有人像他那样,培养了我对于人文学识的判断力与鉴赏力,并督促我严格地一以贯之。我也要向耶鲁大学的其他授业老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韩森(Valerie Hansen)和韩起澜(Emily Honig)致以谢意,他们的授课、学识及友谊赋我良多。我在纽黑文的驻足,如同我对中国深感兴趣一样,都是脑海里那点怪念头的产物:当年作为一名大学新生,我受到一份校园传单的鼓动,注册了一门中文课程。我既要感谢也要责怪姚道中,他为鼓动学生们参加中文课程而往我们的信箱里塞传单。我还要感谢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巴苏(Amrita Basu)、刘易斯(Linda Lewis)、莫尔斯(Sam Morse)、瑟曼(Robert Thurman)、施密特(Helen von Schmidt)以及我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其他授业老师,谢谢他们引领我从多角度观察这个世界。

本书的完成有赖于稀见资料,它们保存于苏州、南京、北京和上海的档案馆及图书馆。我要向林植霖及苏州市档案馆的全体工作人员、苏州市图书馆民国出版物的管理员陈伟、苏州博物馆的吴

琴、苏州大学图书馆的唐先生致以特别感谢。也非常感谢苏州大学的王国平教授以及许金芳，他们慷慨地为我的苏州调研之行提供便利，尤多友爱之情。我还要感谢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于晚清及民国残留的易损资料的认真看护与爱惜之情，令历史研究既成为可能，又相当急迫。

在美国，我能更方便地利用耶鲁大学、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校图书馆以及纽约公立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的资源。我还受益于在台湾“中研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国立”台湾图书馆进行的研究工作。这些机构的图书管理员与工作人员的职业精神与专业技能尤令我感佩，他们为我们构筑了学术生涯的宝库。我尤其感谢莱特曼(Harriet Lightman)与白迪安(Diane Perushek)，他们现在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图书管理员，他们为西北大学收藏部购买了必要的研究资料。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的Pross Gifford及其同事，以及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居蜜(Mi Chu Wiens)与Lily Kecskes，他们令我在华盛顿度过的时间既高效又愉快。我也很乐意向许多台湾学者致谢，尤其是庄吉发、陈三井、徐泓、李孝悌，还有我的台湾大学学长邱澎生、王鸿泰、巫仁恕和我的耶鲁学姐王正华。

非常感谢纽约大学高等学术国际中心“城市与都市知识”项目的博士后计划，我从中获益颇多。谢谢Tom Bender、Alev Cinar、Jordana Dym、Camilla Fojas、Beng-lan Goh、Harry Harootunian、Abidin Kusno、Michael Peter Smith和Gwendolyn Wright，与他们的对话令人难忘。谢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博士后项目，叶文心、已故魏斐德、奚如谷(Steve West)、刘欣、

Robert Ashmore、已故 Alan Pred 及社会地理研究生研讨会的学生们,迅速地重塑了我的这一研究课题。比尔肯大学的会议、工作坊与研讨会,2000 年及 2002 年美国亚洲协会会议(AAS meetings),“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及其他地方的会议都细化了我的这一研究。感谢那仲良(Ronald Knapp)、华琛(James Watson)、维托(Louise De Vito)及其他所有参与者的评论。

非常感谢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与国际及地区研究委员会、太平洋文化基金、美国学术团体协会、鲁斯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谢谢富布莱特委员会(the Fulbright Board),它为我提供了一项初级富布莱特奖学金资助我前往中国台湾,还有一项富布莱特研究基金资助我前往中国大陆。非常感谢吴静吉与台北学术交流基金会,David Adams 及位于华盛顿特区和北京的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CIEE)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同时也要谢谢李轶海、李莉、熊月之、周武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其他学者。

我要向许多朋友和同事致以谢意,他们在我研究、写作与修订此书的过程中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Joel Allen、柯杰诣(James Carter)、金安平、Mei Chin、David Erikson、Khaled Fahmy、Ben Frommer、Michael Hickman、Eddy Zheng、Talbot Imlay、Huri Islamoglu、官绮云、赖德霖、已故 Michael G. Powell、苗可秀(Kristin Mulready Stone)、Paola Zamperini。真心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 Muriel Bell、Kirsten Oster 和 John Feneron。罗芙蓉(Ruth Rogaski)和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审阅了提交出版社的初稿,她们的洞见有助于我完善书稿。谢谢 Henry Binford、Mark Bradley、Bonnie Cheng、Doris Garraway、Carina Johnson、Sarah Maza、森口千晶对于全书或者个别章节的评论。特别感谢麦柯丽(Melissa Macauley)和 Laura Hein 持续的评论性阅读。

Ezra Getzler 审慎地分析并校阅了全文。我非常感谢各位建议者、同事和朋友的慷慨建议与意见。我并不总是采纳他们的建议，但有时也会服膺于他们富有判断力的洞见。此外，本书的任何错误或疏漏都由我负责。我现在终于可以放心地告诉我的父母 James and Barbara Carroll 以及我的弟弟 Brian：“我的论文”终于真正完成了。本书特别纪念两位亲爱的朋友，他们盛年消逝，令人遗憾。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南宋时期的民谚

“城市之中，如同梦幻：万事皆可梦想，只是最不可思议的梦想却是一幅画谜，隐藏了希望抑或恐惧。城市，如同梦想一般，由希望与恐惧构筑，其论述纬度秘不可宣，规则荒诞不羁，观点满纸胡言，事事相瞒。”

“我既无希望也不恐惧”，可汗宣称，“我的梦想是由我的精神构筑，抑或偶然为之。”

“城市也同样相信他们是精神或机遇的产物，但是两者都无法筑起支撑的城墙。你不但乐于解答一座城市的七大谜题或者七十谜团，而且愿意回答它向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隐匿之城》

(*Invisible Cities*) (1974)

追求现代就是探寻自我，我们在这里探险，锻炼能力，收获快乐，得到成长，在我们自身和世界之间转变，同时这里也充满危险，它会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自身。现代环境和经验跨越了所有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地域、种族、阶级、国家界限，以此而论，现代性可谓团结了全人类。但这又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不团结中的团结：它将我们掷入斗争不断瓦解与重建的漩涡中，令我们置身于歧义与痛苦的矛盾中。追求现代就是要成为宇宙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言“宇宙的全部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1982)

目录

中文版序言

致谢

导言	1
苏州城及其方位的象征意义	3
苏州和社会变革	8
空间变化与社会转型	12
城市空间与地方	17
思想观念的转变	19
国家范畴内的地方国有化及其定位	21
本书框架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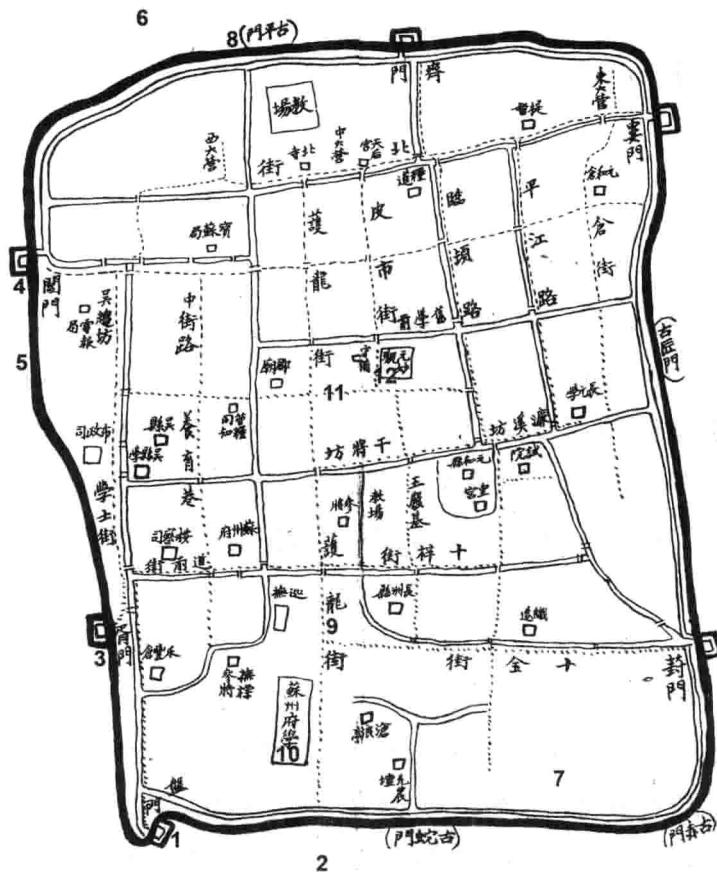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从道路到现代性

第一章 马路：工业与恶习的诞生地	31
苏州的城市道路及其国际/国家意义	32
马路：外国技术的本土化	38
商务局：防御性发展与官僚资本主义	40
张之洞的设想：作为工业防疫线的马路	43
资助商务局之争	47

导 言

在清代的暮光中,文化古都苏州向一座现代城市的目标迈开了重建的步伐。本书探究各种群体的经历,包括失地贫民与商界翘楚、中国人与外国人、本地人与外来客等。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这项研究所涵盖的空间与时间的转型产生了相互关联。尽管对新鲜事物持自觉意识的人认为,现代城市与已经存在的商业、建筑、国家权力和社会组织等固有模式完全不同,可是具有分离性的现代城市仍不可避免地在物质、精神与经验上具有历史的痕迹。这种承继在现代性的蒸发与凝聚过程中扮演着必不可少但又模糊不清的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帝国主义的进攻,民族主义勃然兴起,地方被视为具有特殊的传统价值,同时也被视作民族价值观的宝库。^①与之相似,经济的发展也会为地方与国家带来双重利益,尽管很多时候两者实际上处于冲突之中。城市景观的转型,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还是自然的,均受到国外城市规划专家技术与实践的影响。有鉴于此,城市重建这一领域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人”整体性或是苏州当地文化认同的关注。这一过程的戏剧性与苏州曾经拥有并且继承的独特美景及丰富历史紧密相连。整座苏州城由深墙庭院中的低层建筑隔开,运河边上坐落着明代风格的白墙矮屋。名胜古迹,狭窄坑洼的街道,文人学士的园林,寺庙,集市,寮棚,更不用说数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人类经验,既促进了也妨碍了由国家及商业主导的城市现代化。

蘇城全圖



苏城全图,晚清

1. 盘门
2. 日本租界,马路
3. 背门
4. 阖门
5. 新闻/金门
6. 铁路站
7. 南花园
8. 旧/新平门
9. 护龙街
10. 苏州府学
11. 观前街
12. 玄妙观

资料来源：曹允源、李根源编《吴县志》图，苏州文新书局，1933年。

19世纪90年代以降，在苏州由商人和政府官员主导的国家及地方政治经济体开始挪用并采纳西式都市计划。这一过程导致城市空间在人文和自然领域的变化及转型，反过来这种变化和转型又重塑了城市社会与经济的关系。都市计划的初期阶段，商业及民族主义迅速膨胀，现代主义不断累积，苏州既作为一个整体，同时也作为城市景观的独特部分（特别是道路、寺庙和古迹）而被